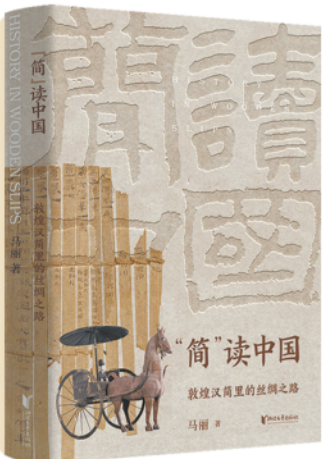
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在丝绸之路研究热潮持续升温的当下,甘肃简牍博物馆马丽所著《“简”读中国: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》(以下简称《“简”读中国》),以敦煌出土的汉简为史料,串联起汉代丝路的政治往来、军事战略、制度创新与文明交融,让沉睡两千年的木简“开口说话”,辅展开一幅有温度、有细节、有风骨的汉代丝路实景图。



打捞被正史忽略的细节

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,往往依赖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传世典籍。这些官方正史的目光,多聚焦于帝王将相的经略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演进,对于底层民众的生活图景,日常往来的琐碎流程,只是寥寥数笔。敦煌汉简的出土,为这些留白填上了生动注脚。

沉睡千年的木简,记录着公文传递、食宿接待、物资调配等日常事务,堪称汉代丝路的“即时通信记录”。《“简”读中国》将简牍释文、考古背景与历史延伸衔接起来,使得碎片化的文物信息串联成链。

书中对汉廷与大月氏交往的考证,便是例证。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故事,早已深入人心,但宣帝甘露年间与大月氏的往来细节,传世文献却语焉不详。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一枚木简,记录了甘露二年(公元前52年)朝廷下发的传信,要求沿途驿站接待护送大月氏使团。这枚木简印证了汉朝与大月氏官方往来的延续性,并通过“主客郎中”“都内令”等官职名称,“二封轭传”的接待规格,把外交流程与驿站制度具体化呈现出来。

汉元帝永光五年(公元前39年)的“康居王使者册简”,则是一段被正史彻底遗忘的历史。木简详细记录了康居王使者、苏雍王使者等人献赛驹时,因酒泉太守单方面将“肥壮白驹”定为“羸瘦黄驹”而引发的纠纷。这起看似不起眼的贡物估值争议,还原了汉代贡赐贸易的流程规范,并暴露出当时汉朝同康居结盟匈奴而产生隔阂,让一段尘封的外交博弈浮出水面。

“浮屠简”中“小浮屠里”的记载则改写了历史。“浮屠”是佛陀的梵语音译,以其命名乡里,意味着佛教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已传入敦煌并融入民间生活,这一发现将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提前了近两个世纪,打破了“佛教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原再西传”的固有认知。而“折垣王献狮简”,则证实西汉后期折垣王已遣使向汉朝献狮,汉廷专门派“钩盾使者”迎接,沿途驿站提供肉食优待。过去,传世文献中仅见东汉西域献狮的记载,这枚木简印证了丝路物种交流的先发性。

从“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简”中记录的三百八十四人使团饮食开销,到解忧公主归汉的沿途接待传信,从匈奴日逐王归汉的膳食安排,到译人调配的公文指令……丝绸之路不仅是“使者相望于道”的宏大通道,更是由无数次驿站接待、物资调配、公文传递、民间往来构成的鲜活网络。这些被正史忽略的“小事”,恰恰是构成丝路历史的基石。

简牍凝岁月 丝路续前缘



敦煌莫高窟壁画《张骞出使西域图》(局部)

跨越山海的坚守与奉献

丝绸之路的繁荣,是一代代行者用脚步丈量、用生命坚守的成果。《“简”读中国》以敦煌汉简为线索,勾勒出一组立体丰满的丝路人物群像。其中,既有张骞、赵充国这样的历史名人,也有冯嫫、少夫公主、译人、戍卒等在史书中默默无闻的角色。

张骞“凿空”西域的壮举,早已载入史册,但悬泉汉简的记载,让这位开拓者的形象更加鲜活。《“简”读中国》通过考证张骞出使西域路线与悬泉置遗址的关联,还原了他第二次出使西域后,西域诸国使者相继归汉的场景。正是他“十三年持节不失”的坚守,为丝路畅通奠定了基础。而简牍中关于“大月氏诸国客”的接待记录,印证了张骞之后汉与西域诸国友好往来的延续性,让他的功绩不再局限于联络大月氏的单一使命,而是成为贯通丝路的标志性符号。

丝路行者中,几位女性的身影格外动人。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五十年,历经三次婚姻、数次宫廷变故,始终坚守汉乌联盟的初心。一枚木简详细记录了汉廷为其安排沿途接待的传信,短短“有请诏”三字,既体现了皇帝的恩准,更暗含着对她半生奉献的认可。她的侍女冯嫫,凭借精通史书、熟悉西域事务的优势,多次持节出使诸国,被后世誉为“女张良”。有一枚木简就记载了鱼离置为其提供马匹和饲料的费用明细,这份看似普通的账目,成为冯嫫外交功绩的实物佐证。在乌孙内乱、汉廷欲派大军讨伐时,正是她只身前往北山劝说,避免了一场战争。

第一任和亲乌孙的细君公主,故事则充满了悲壮。远嫁异域的她,面对语言不通,习俗迥异的困境,写下“居常土思兮心内伤,愿为黄鹄兮归故乡”的悲歌。而木简中“乌孙公主女少夫遗质子马一匹”的记载,证明她的精神得以延续。少夫公主长大成人后,像母亲一样活跃在西域外交舞台,用“遗质子”的行动巩固汉乌关系,填补了史料中有关其生平的空白。简牍中提及细君公主创制琵琶的传说,更让这份悲情公主多了一层文化使者的传奇色彩。

书中的男性角色,同样闪耀着光芒。古稀之年的老将赵充国,主动请缨平定西羌,一枚木简记录了他护送羌人入朝的事迹。他不主张武力征伐,而是通过屯田安边、分化部署的方式,实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,既平定了羌乱,又促进了民族融合。与他类似,长罗侯常惠出使西域二十余年,联合乌孙击败匈奴,平定龟兹内乱,“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简”中详细记录了对其牛羊酒食的供应。这位曾被匈奴囚禁十余年却始终坚守气节的使者,最终凭赫赫战绩封侯。

书中还聚焦了许多丝路底层从业者。简牍中频繁出现的“译人”,包括羌译、匈奴译、羌胡译,一枚木简记载的朝廷调拨羌译到敦煌的史实,印证了翻译人员在丝路交流中的基础作用。戍卒与施刑士们驻守边疆,屯田劳作,一枚记录遣送施刑士到伊循屯田的木简,见证了他们用艰苦付出保障丝路畅通的坚守。悬泉置的畜夫、驛骑们,负责公文传递与使者接待,“阳朔二年传车置簿簿简”记录了对传车的严格管理细节。这些材料让我们看到,正是无数平凡人的默默坚守,让庞大的丝路网络得以高效运转。

汉代治理智慧的回响

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,背后离不开汉代成熟的治理体系,其中蕴含着东西方文明交融共生的深刻内涵。《“简”读中国》通过解读屯田、邮驿、水利、外交等制度,展现了汉代对河西走廊及西域的有效治理,还原了东西方物质、文化、宗教的深度交流。

汉代的治理智慧,首先体现在对西域的经营策略上。屯田制度便是核心举措之一。书中详细介绍了渠犁、伊循、车师等地的屯田情况,一枚木简记录了甘露四年(公元前50年)西域都护府为渠犁屯田斥候返回北军开具的传信,印证了渠犁屯田“给使外国者”的作用。军屯与民屯结合,既解决了驻军与使者的粮食供应,又将中原农耕技术传入西域。悬泉汉简中关于“施刑士”的记载,则揭示了屯田人员的多元构成,这些被赦免的囚徒在西域从事耕种、戍守等工作,成为丝路建设者。伊循屯田的设置更具战略意义,一枚木简记载了伊循都尉隶属于敦煌太守管辖的史实,证明汉廷通过在鄯善伊循城屯田,牢牢控制了丝路南道的咽喉要道,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奠定了基础。

邮驿制度的完备,则是丝绸之路高效运转的重要保障。作为汉代丝路的重要驿站,悬泉置承担着公文传递、使者接待、物资转运等多重职能。《“简”读中国》详细记录了从御史大夫到敦煌太守,效谷县再到悬泉置的公文传递流程。从长安下发追查丢失传信的通告,到敦煌郡接收转发,仅用一个半月,而效谷县到悬泉置更是次日即达,这在两千年前堪称高效。

类似细节还有很多。“传马名籍簿”记录了悬泉置传马的毛色、年龄、身高等信息,反映了汉代对驿马的严格管理。“阳朔二年传车置簿簿简”则展现了驿站对交通工具的日常维护,六乘传车中有三乘因曲折,轮轴无法使用,既体现了驿站工作的细致,也反映了丝路交通的繁忙。这些简牍共同构成了汉代邮驿制度的全景图。

此外,汉代的水利建设,民族管理,法律执行等制度,在简牍中也均有体现。木简中“穿渠校尉”的设置,体现了汉代对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视,通过兴修水利,朝廷解决了屯田灌溉与军粮运输的难题。木简中“护羌使者”与“护羌校尉”的并存,展现了汉代对少数民族的分层管理策略。御史大夫杜延年签发的传信木简有“当舍传舍,如律令”的表述,则彰显了汉律的刚性约束。这些细节彰显了汉代“大一统”理念下的治理智慧,即尊重地域差异,兼顾军事防御与经济发展、注重制度建设与执行。

至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,物质层面最为直观。大月氏献贡,折垣王献狮,康居国献赛驹,都印证着丝路物质交流的密切。而中原的丝绸、茶叶、铁器,农耕技术等,也通过丝路传入西域,汉简中关于“苜蓿草”“粟米”的供应记录,新疆昭苏乌孙墓葬中出土的汉代陶罐、铁犁铧,都见证了汉文化对西域生产生活的深刻影响。这种交流是互利共赢,大宛的汗血宝马提升了汉朝骑兵实力,西域的葡萄、苜蓿丰富了中原物产,康居的赛驹成为丝路运输的工具,“殊方异物,四面而至”的局面由此形成。

文化的交流同样无处不在。龟兹王绛宾与解忧公主之女弟史的结合,便是文化交融的典范。一枚木简记录了二人路过悬泉置时受到高规格接待,他们带回长安的龟兹乐器又与中原乐舞结合,后来推动了龟兹乐舞的发展,并为后世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场景打下伏笔。

从敦煌悬泉置的残简断牍,到如今“一带一路”的繁忙商道,丝绸之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与文明智慧。这份从历史中走来的文明力量,正是当代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的珍贵财富。

相关阅读

1.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汉代丝绸之路的考古与历史》,文物出版社
2. 荣新江:《从张骞到马可·波罗:丝绸之路十八讲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
- 3.[英]彼得·弗兰科潘:《丝绸之路:一部全新的世界史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

读书单

《事物的起源:简明人类文化史》

[德]尤里乌斯·E.利普斯 著
汪宁生 译
后浪 |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这是一本文化人类学普及著作,它以“考察事物的起源”为主旨,从大量实地考察与征引所得的案例材料出发,在风趣的文字和写实的插图中挖掘人类的故事。作者利普斯注意到,人类文化早期发明者的贡献既引起当代大众广泛的好奇心,也是世界大同的引路标之一。因此,全书包罗衣食住行、风俗习惯、生产方式、社会制度等贴近日常生活的主题,同时伴有许多深入浅出的思索,可谓一本简明而意蕴深远的人类启示录。



《中国记事:1912-1928》(全两卷)

王笛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探讨1912年—1928年中国的历史,展示了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和社会变迁。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,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面临怎样的挑战?中国人怎样选择他们的未来?本书通过挖掘历史上来自华西方人的记录,展示了辛亥革命、中国参加巴黎和会、五四运动爆发、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收回山东主权等重大事件和过程,讲述这一时期来华的外交官、记者、作家、学者、旅行者的曲折经历和精彩故事,观察美日博弈如何影响中国命运。



《变局与定力》

郑永年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全球局势动荡不安,大国博弈日益激烈。当代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,如何应对?中国如何与美国打交道,如何回应和管理西方的“对华恐惧”?如何走出经济内卷?人工智能时代,我们应向何处……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郑永年近年来对国际时局大趋势研究的回归之作,带领读者读懂时局,趋势,中国发展机遇与挑战,在嘈杂的时局变化下,厘清大国博弈的核心逻辑,剖析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战略选择与发展路径。



(□记者 蔡可心 整理)

我与书的故事

“三进三出”读红楼

□ 陈明

读《红楼梦》,一直心心念念。很早前是在小叔家的矮柜上见过,有砖块那么厚,泛黄的纸,卷曲着角,还缺了不少页,一翻有股好闻的油墨味。这本有些年头的《红楼梦》陪了我好一阵子。后来,或许是文字太拗口,或许是当时识字不多,根本就看不懂,或许是有别的感兴趣的事,在懵懵懂懂、囫圇吞枣地好一顿翻看之后,又还给了小叔,脑子里也没留下什么。

后来上军校期间,兴过一阵“名著热”。随大流,我也到图书馆借出一些中外名著。白天摸爬滚打,操枪弄炮,晚上忙里偷闲,见缝插针,煞是用心。自习室里加过班,走廊里熬过夜,值班执勤还误过岗,挨过骂受过罚,却乐在其中。后因学习训练日益紧张,闲情逸致终敌不过皮肉之累。东躲西藏地坚持了一阵子,那本《红楼梦》还是被偷偷地还了回去。

后来,工作了,成家了。整天被裹挟着推动着,忙得脚不沾地。读书学习的目的性清晰而直接,闲娱,闲书离我越来越远,更别提读《红楼梦》了。

再后来,互联网来了,智能手机也来了。在家长们一片“狼来了”的惊呼中,“许久没有读过一本书”“几个月甚至几年没有去过书店”,一时间,竟成了不少成年人红脸出汗的感叹。就连街头的书报亭,几乎是一夜的工夫,都不知躲哪儿去了。有一回在公交车上,我随手拿出女儿新到的杂志,竟引来不少学生家长羡慕的眼光,有的还不时与孩子窃窃私语,弄得我倒不好意思了,赶紧将书收了起来。捧起书来,什么时候成了件奢侈的事了?

前些天,我和爱人先后都感冒了,生活顿慢了。有天整理房间,竟拾掇出一套满是灰尘的《红楼梦》。爱人见状,戏言:反正现在也“居家”了,何不挑战一下耐心和定力,你若能读进去,我就包揽家务,如何?

决不能让人小看!于是,我围裙一摘,手机一丢,应战了。一壶茶,一本书,沙发里,阳台上,被窝里,一行李,一页页,一回回,艰难地往前拱着。一度放下,捧起,再放下,又捧起。吐槽过词句酸涩、拿捏作势,笑话过曹公啰嗦、宝黛多情,抱怨过庶出亲生,主仆难辨……就连在外读书的女儿也帮着支招:试着理出人物关系图,书柜里还有本《红楼梦中人》可作工具书,相信你行!在坚持与煎熬中,我慢慢也找到了感觉:一目三行是看不下去的,心有杂念是看不进去的,碎片化阅读《红楼梦》是徒劳的。再就是那些建筑装饰,诗词文字,穿戴饮食,风俗礼仪,真是博大精深、美妙绝伦……

至于何时退烧的,体重怎么时间增加,家务是怎么又重新回到我这里的,都记不清了。作为枕边书,每晚我都要看上几回。自己也随着那一个个生动饱满的人物,一出出因果善恶的故事,繁华沉浮,跌宕起伏……原来,读《红楼梦》不难。

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?请用千字左右,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知的故事。欢迎来稿。
投稿邮箱:dazhongribawt@163.com



山水之下,读懂王维的圆融



□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张如心

说起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诗人,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不一定是王维。但若多几次追问,这个名字出现的序位该不会超出前几。我们自幼吟诵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”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却往往难以勾勒其清晰面容。他长久地被“诗佛”“山水田园诗派代表”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等标签稳妥包裹,成为一个近乎固化的文化符号。青年作家、诗人李让眉的新作《王维十五日谈》,则试图穿过这些

层叠的标签,细解王维的生平、时代、亲交、情感、宗教、绘画、音乐、诗艺,还原王维的人生境遇与精神世界。通过这十五篇漫谈,我们也许可以看见历史帷幔下最真实也最通透的王维。理解王维,需要一种动态的视角。一杯均匀的盐水并无可观,美的是盐粒入水消融的过程。王维诗境中的“宁静”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恒定状态,而是在宦海沉浮、家国剧变与道德困境的激荡中,逐步抵达的精神境界。

王维,字摩诘,少年时便才华横溢,十五岁入长安,十七岁便以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诗句触动千年人心。他精通音律书画,曾凭一曲琵琶声动四座,得玉真公主赏识。开元九年,王维高中状元,步入仕途,春风得意。然而,“黄狮子案”却让他被贬为济州(今山东聊城一带)司仓参军,掌管仓廩租赋等琐务,位卑事杂。

这不仅是他仕途中第一次遇到重大挫折,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远离长安,深入地方,王维也因此与山东结下不解之缘。初至济州,王维在《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》中流露出“纵有归来日,各愁年鬓侵”的惆怅。但正是在这里,山水抚慰了他的失意,他初步写得了田园之趣。在《济州过赵叟家宴》中,他写下了“深巷斜晖静,闲门高柳疏”的简朴生活图景;在《济州冬日》中,他写下“独坐幽篁里,悠然见南山”的冬日雪后景致。济州的山水与民情,洗去了长安的浮华。这段看似困顿的外放岁月,让曾游走于王公贵胄之间的诗笔,开始浸润田

园的恬淡与宁静,也为他日后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,积淀下本真的观照力。

如果说济州是王维被迫的“远行”,那么辋川则是他主动选择的“归处”。张九龄执政期间,王维一度被擢为右拾遗。但随着张九龄被贬,他也遭排挤,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凉州(今甘肃武威)。苍茫边塞的壮阔风光重塑了他的诗境,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,与早年清新之作交融,开辟出更为开阔的气象。回到长安后,面对李林甫专权,王维意兴阑珊,渐生隐逸之心。四十多岁时,他用半生积蓄在终南山麓的辋川(今陕西蓝田西南)买下一处旧宅,这里依山傍水,成了他精神的家园。他悉心营建,将辋川打造成充满诗意的园林。辋川因他而名动天下,成为后世文人向往的桃源。唐代诗人钱起的《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》一诗中“谁谓桃源里,天书问考槃”,就将辋川与桃花源等列。王维与好友裴迪悠悠游其间,为美景赋诗,“一景一诗”对应辋川二十景,最终结为《辋川集》。他一生中最好的诗篇,大多诞生于此。

王维是个擅长自我疗愈的诗人,这也意味着他本身容易受到伤害,他会悲伤,懊悔,也时常忧愁、失落,艺术赋予他的敏锐本就是双刃剑。安史之乱中,王维被俘,装病不得而被迫接受伪职。这件事对他的道德信念造成摧毁性冲击,也成为他唯一一次自愈失败的经历。肃宗上元二年,王维悄然离世。弟弟王缙遵其遗愿,将他安葬于辋川母亲墓旁。王维最终长

眠于明月清风,松竹泉石之间,与他魂牵梦绕的山水永存。

大抵是深刻体验到了人生的无常,王维持斋奉佛,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,他将禅意、禅境融入诗歌创作,因此被称为“诗佛”。而他本人,也形成了一种圆融的精神境界。在写给堂弟王缙的《赠从弟司库员外》一诗中,他坦言“少年识事浅,强学干名利”,承认自己并非非生来通透,早年亦曾追逐功名,只是仕途屡屡受挫,辗转外放,几次反复后,他逐步接纳并最终安于辋川的寂静生活。但所有的寂静生活都是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中逐步穿越而抵达的。美国诗人戴维·辛顿也认为,王维的诗歌中有一种自我圆融的光辉,从光辉中抵达一种沉寂。

时至今日,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依然闪烁着不可替代的光辉。在喧嚣纷扰的现代生活中,这些诗作宛如一脉清泉,滋养着无数后人。通过对自然之美的静观与描绘,引领我们暂离俗累,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的舒放与慰藉。寂静并非枯寂,而是充满生机与悠然自得。独坐幽篁,弹琴长啸,与明月相伴;行至水穷,坐看云起,偶与林叟谈禅。这份跨越千年的“闲情逸致”,并非消极避世,而是一种对生命本然状态的回归与观照,唤起对和谐、宁静与自在生活的向往。

正如李让眉所言,山水永远不该被摩崖石刻定义——它是松风,是落英,是明月,是积雪,是所有的“流逝与再生”。